

#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多因素动态关系分析

——基于 1983—2009 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乔俊果<sup>1</sup>, 金晓宸<sup>2</sup>

(1. 广东海洋大学 经管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25; 2.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 广州 510725)

**摘要:** 基于中国 1983—2009 年的数据, 利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系统地分析了市场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力、拉力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冲击。结果表明, 市场化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从短期来看, 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冲击的波动幅度最大, 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影响存在时滞, 市场化改革的冲击持续为正, 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的冲击快但波动幅度较小。这说明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未深入改革之前, 以市场机制主导的非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蓄水池, 发展和壮大此类部门, 鼓励其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等市场化制度安排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 同时, 政府应从统筹城乡的角度, 提高农业补贴和加大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力度。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 流动因素; 市场化改革; 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负担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2-0016-07

##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multiple factors in rural labor migr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1983 to 2009

QIAO Jun-guo<sup>1</sup>, JIN Xiao-chen<sup>2</sup>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25, China;

2. Guangzhou Maritime College, Guangzhou 510725,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ization refor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pulling and thrusting factor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by using Co integration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83 to 2009 in China. The empirical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mong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ural labor burden and the ratio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short term, rural labor force's own innovation fluctuations is the greatest, the impact from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delayed, market-oriented reform impact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is continually positive, the impact from the burden on rural labor force status responses timely and slightly. Hence,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non-state-owned sector or the informal sector which is dominant by market mechanism is the reservoir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until the labor mobility system barrier is thorough removed. As a result, the marke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developing the non-state-owned sectors and encouraging their entry into some monopoly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rural labor migr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the rural durable consumer goods subsidies in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Keywords:** rural labor force; factors causing migration; marketization reform;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rden on rural labor force

##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就业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 也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化体制的改革, 越来越多的农

民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据统计, 2009 年我国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已达到 36.6%, 这意味着已经有超过 1/3 的农村劳动力转化成产业工人,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

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已然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他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建立了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的模型、<sup>[1-3]</sup>户籍约束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数理模型。<sup>[4-6]</sup>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微观调查数据, 包括从个人层面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sup>[7,8]</sup>以及从

收稿日期: 2012-03-18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1WYXM030)

作者简介: 乔俊果(1978—), 女, 山西稷山人, 助理研究员, 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洋渔业经济。

家庭层面研究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sup>[9]</sup>但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因素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如何?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如何?这些研究并未解答。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理论来自Lewis和Todaro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他们的模型为研究劳动力迁移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多沿用此框架。研究成果有拓展研究假设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sup>[4,7,10-13]</sup>一些学者将城市劳动力需求部门分为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或只招收城市劳动力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推导了户籍制度约束下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各因素。<sup>[1-3,5]</sup>他们所用模型即是拓展了Todaro模型中城市劳动力需求部门同质性的假设,将其分为农村劳动力已进入的部门和不易进入的部门。

在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中,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或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及家庭结构、社会资本等。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分为三类:推力因素、拉力因素及制度因素。推力因素的代理变量主要是人均耕地面积,拉力因素的代理变量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sup>[2,7,11]</sup>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偏向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与城市户籍相挂钩的歧视性因素导致我国劳动力的流动并不自由和充分。<sup>[3]</sup>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集中在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就业、工资、教育和培训等方面。<sup>[14]</sup>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有学者考虑了市场化体制改革因素,对总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市场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显著为正,推力作用远远大于拉力作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很大程度上是被动转移而非主动迁移。<sup>[15]</sup>

上述研究加强了人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静态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调研期内劳动力流动的各影响因素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尚不能揭示各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冲击效应及其传导过程。也就是说,有关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其影响

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有待考察。其次,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非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这些部门是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改革背景下逐步发展壮大的。市场化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过程,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等的变革。<sup>[16]</sup>尽管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因素确实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制度因素,但户籍制度仅是市场化体制改革中的一环。<sup>[17,18]</sup>如何量化这一体制改革大背景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各因素的动态影响,显然十分必要,但现有的研究并未解决此问题。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异质性对迁移的作用不显著,在不考虑劳动力异质性的前提下,市场化改革对总量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各因素的动态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而定量地反映这一体制变革因素的作用对于人们深入认识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统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拟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态影响,同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IRF)来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各影响因素冲击的响应过程,细致刻画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动态路径,从时间序列角度加深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解。

## 二、实证方法与样本数据

### 1. 理论分析与假设

本文研究的是全国范围的总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尽管分地区进行考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比例很大,如果要按区域描述劳动力流动状况,现有的统计数据不足以支持研究的开展。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跨区域迁移和流动表现为欠发达地区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流动,比例约为20%,从计量实证的角度而言,不容易满足有关扰动项独立同分布的假设。<sup>[19,20]</sup>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在Todaro框架下设定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包括推力和拉力以及市场化体制改革三个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农村劳动力是匀质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劳动力的质量差异在事实上并不显著。这样假设比较接近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现实。<sup>[21]</sup>一般而言,劳动力质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人力资本水平上,通常以正规教育年限反映,实践中,迁移的农村劳动力与未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在教育

程度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而且,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部门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该项劳动并不要求劳动者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即劳动力质量差异引致的就业结果差异很小。同时,该项假设可以使劳动力流动的分析简洁化。

假设2 农村劳动力流动源于推力和拉力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预期城市高收入以及获得高收入的机遇大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从储蓄和改善家庭生活的角度而言,农村劳动力所负担的支出增加是推动其流动的因素。

假设3 农村劳动力获得高收入的机遇取决于市场化体制改革进展程度。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获得高收入的机遇取决于需求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在我国二元结构社会中,由于户籍等歧视性劳动力制度障碍,农村劳动力仅能进入市场化的部门和领域,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

## 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按照上述假设,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为:

$$TRANS=f(INRATIO, AFFORD, MS)$$

其中  $TRANS$  为劳动力流动规模,  $INRATIO$  为城乡收入差距,  $MS$  为市场化体制因素,  $AFFORD$  为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因素。

研究区间为1983—2009年。由于本文研究使用的是年度数据,考虑样本量与变量之间的相容性,每个因素选择一个代理变量,为反映更多的信息,本文的代理变量选取相对数而非绝对数。

微观研究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多以调研区某一时间区间内劳动力流动的数量为代理变量。宏观研究中,由于有关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绝对数统计数据不支持,农村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就业状况较好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的总体状况,因此,本文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 $TRANS$ )为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 1988, 2010)。统计表明,样本区间平均劳动力流动比例占总劳动力的20%以上并保持稳健的上升态势,2009年为35.2%,以此推算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约为1.4亿人。

理论上农村劳动力流动拉力因素来自于预期的城市收入与农业收入之差,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拉力因素。本文借鉴蔡昉的研究,以城乡人均收入比为代理变量( $INRATIO$ ),人均收入通常是揭示城乡差

距更好的指标。<sup>[22]</su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统计表明,人均收入比在样本区间内表现出曲折上升的趋势,最小值在1983年为1.4,1994年至1996年间略有下降,此后持续上升。

市场化体制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及法律的变革,衡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研究一般采取构建指标体系,结合主、客观评价法进行综合,形成指数。现有研究市场化程度的文献成果中,具有权威性和连续性的主要有樊纲《中国各地市场化相对进程(系列)》和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系列)》。二者评价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均涵盖了五个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及法律市场的发育,比较全面地反应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文以市场化指数( $MS$ )作为市场化体制改革的代理变量。本文市场化指数以李晓西研究的市场化指标体系为基础,1983—2008年的数据来自曾学文的研究数据,2009年以上指标体系推算。<sup>[23]</sup>样本区间的最小值为41.43,最大为76.62,平均为64。

关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推力因素,本文的研究并未采取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人均耕地经营面积作为代理变量,而是用每劳动力经营农业的收入与所负担的消费支出比例作为其代理变量。<sup>[2,7]</sup>之所以这样处理,基于如下考虑:作为劳动力非农就业推力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状况,但是农业生产周期较长,生产可控性因素较少,受到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耕地经营面积大不一定能有较高的产量;更重要的是,在农产品可比价格多年以来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即使产量高也未必取得良好的经营收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均耕地面积与经营收益之间并非是完全正相关的,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忽略了农业经营效率这一重要因素,以人均耕地面积作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总量方面的代理变量有可能使估计结果不可靠。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农村劳动力的抚养比例约为城镇劳动力的1.5~1.8倍,这就意味着,在相同的购买力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消费支出负担比要比城镇劳动力大,出于家庭生活改善的压力,农民转换职业的动力更强,这与人们的经验十分相符。因此,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推力变量既要考虑到从事农业的收入,又要考虑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采用了每劳动力经营农业的收入

与所负担的消费支出比例更能反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推力因素。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AFFORD*)由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乘以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与农村居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之比计算得出。农村劳动力报酬、农村居民物价消费指数、农村居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据来自《中国农村住户调查2009、2010》。在样本区间内,农村劳动力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与其负担的家庭消费性支出的盈余比经历了一个缓慢上升而后逐渐下降的过程,2000年之后此比例逐渐变为负数。

###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 1. 协整与模型的构建

一般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VAR模型则要求各变量具有同阶平稳性。笔者首先对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对数化,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各变量ADF检验结果。

从表1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TRANS*)、推力因素的代理变量城乡收入比(*INRATIO*)和拉力因素

的代理变量每劳动力经营农业的收入与所负担的消费支出比例(*AI*)以及市场化指数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表1 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t统计量	P值	检验结论
ln <i>TRANS</i>	(C,T,1)	-3.568 3	0.224 0	非平稳
ln <i>INRATIO</i>	(C,T,1)	-3.568 3	0.170 2	非平稳
ln <i>AFFORD</i>	(C,T,1)	-3.568 3	0.327 9	非平稳
ln <i>MS</i>	(C,T,1)	-3.568 3	0.731 5	非平稳
D(ln <i>TRANS</i> )	(C,T,0)	-1.952 9	0.039 6	平稳
D(ln <i>INRATIO</i> )	(C,0,0)	-3.670 1	0.034 7	平稳
D(ln <i>AFFORD</i> )	(C,T,0)	-3.568 3	0.000 3	平稳
D(ln <i>MS</i> )	(C,T,0)	-3.568 3	0.006 9	平稳

注: 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D表示一阶差分; 检验基于5%的显著性水平

在确定变量同阶平稳性之后,笔者进一步分析四个变量之间有无协整关系,如果协整关系成立,则可构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与其影响因素城乡收入比、每劳动力经营农业的收入与所负担的消费支出比例及市场化进程变量的VECM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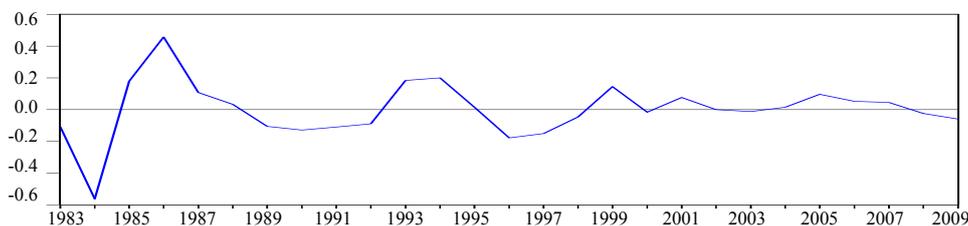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协整图

从协整图中可以看出,有两个时间段偏离长期均衡的幅度较大,可以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长期均衡的偏离发生在两个转移高潮期。第一个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高潮是1983—1986年,偏离幅度高达0.37,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1983年后,全国各地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农村劳动力季节性过剩逐步显现出来。<sup>[24]</sup>与此同时,国家下发了一系列放开农村市场、鼓励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政策文件,农村劳动力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比例迅速提升。尽管在1989—1991年出于经济环境治理、城市治安及失业等压力,农民流动政策调整,发起了一轮农民工清退潮,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乡镇就业宽松的管理,促进了农村

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使得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高潮形成(1993—1996年)。<sup>[25,26]</sup>

VECM模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 $p$ 时,一方面要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会减少。所以研究者通常在选择滞后阶数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表2是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

从表2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运用似然比检验法(LR)、赤池信息准则(AIC)及HQ准则下最优的滞后阶数都是2阶,因此,笔者确定滞后阶为2阶,并进一步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表3列出了滞后阶为2阶的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表2 滞后阶数的检验

滞后阶数	LogL	LR	AIC	SC	HQ
0	117.522 1	NA	-7.829 1	-7.640 5	-7.770 0
1	146.427 3	47.843 1	-8.719 1	-7.776 1*	-8.423 8
2	168.112 5	29.9106 *	-9.111 2*	-7.413 8	-8.579 6*

\*表明滞后阶的最佳选择

表3 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零假设	F值	P值
INRATIO 不是 TRANS的格兰杰原因	3.026 9	0.041 3
TRANS不是INRATIO的格兰杰原因	0.844 6	0.537 9
AFFORD不是TRANS的格兰杰原因	6.790 0	0.001 4
TRANS不是AFFORD的格兰杰原因	5.075 9	0.005 6
MS不是TRANS的格兰杰原因	3.865 6	0.017 3
TRANS不是MS的格兰杰原因	4.512 0	0.009 3
AFFORD不是 INRATIO的格兰杰原因	0.876 2	0.518 8
INRATIO不是AFFORD的格兰杰原因	18.912 4	0.000 0
MS不是INRATIO的格兰杰原因	9.529 5	0.000 2
INRATIO不是MS的格兰杰原因	0.648 7	0.666 6
MS不是AFFORD的格兰杰原因	19.691 2	0.000 0
AFFORD不是MS的格兰杰原因	2.749 3	0.056 1

从表3可以看出, 城乡收入比(INRATIO)、农村

劳动力负担状况(AFFORD)及市场化(MS)都是农村劳动力流动(TRANS)的格兰杰原因, 这说明托达罗模型的劳动力转移机制在我国是成立的。AFFORD不是INRATIO的格兰杰原因, INRATIO不是MS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收入差距并不一定引起市场化改革。

## 2. 协整估计及误差修正机制

由于仅有一个协整关系, 可以测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协整方程为:

$$TRANS_{t-1} = 0.277 \ln MS_{t-1} + 6.377 \ln INRATIO_{t-1} + 27.432 \ln AFFORD_{t-1} - 6.535$$

选取含截距和不含时间项的线性趋势假设, 误差向量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表4 误差向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D(TRANS)	D(MS)	D(AFFORD)	D(INRATIO)
CointEq1	-0.001 4 [-0.794 1]	0.010 7 [3.264 7]	-0.030 7 [-25.111 2]	-0.002 1 [-1.072 9]
D(TRANS <sub>t-1</sub> )	0.394 7 [1.996 81]	0.006 0 [0.016 8]	0.181 7 [1.364 9]	-0.357 1 [-1.704 2]
D(TRANS <sub>t-2</sub> )	-0.024 7 [-0.149 3]	-0.141 2 [-0.471 8]	-0.250 5 [-2.248 7]	0.082 2 [0.469 3]
D(MS <sub>t-1</sub> )	0.059 2 [0.407 4]	0.294 4 [1.120 3]	(0.097 8) [1.174 1]	0.241 5 [1.568 8]
D(MS <sub>t-2</sub> )	-0.043 9 [-0.326 2]	-0.043 4 [-0.178 2]	0.218 6 [2.414 2]	-0.409 6 [-2.873 7]
D(AFFORD <sub>t-1</sub> )	0.294 0 [3.973 0]	0.077 0 [0.574 7]	-0.027 8 [-0.558 7]	0.076 6 [0.977 1]
D(AFFORD <sub>t-2</sub> )	0.205 5 [3.063 0]	0.050 5 [0.416 3]	-0.039 3 [-0.871 1]	0.114 2 [1.606 3]
D(INRATIO <sub>t-1</sub> )	-0.108 6 [-0.706 8]	-0.141 9 [-0.510 8]	-0.296 8 [-2.870 4]	0.594 1 [3.649 1]
D(INRATIO <sub>t-2</sub> )	0.311 4 [1.946 3]	-0.072 7 [-0.251 2]	-0.042 9 [2.136 8]	-0.146 5 [3.043 3]
C	0.011 0 [0.768 4]	0.049 7 [1.914 6]	0.020 6 [2.136 8]	0.046 2 [3.043 3]
R <sup>2</sup>	0.829 7	0.474 5	0.983 4	0.666 7
修正 R <sup>2</sup>	0.739 5	0.196 3	0.974 6	0.490 3
F统计量	9.201 9	1.705 7	111.761 3	3.778 6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推力因素、拉力因素以及市场化指数之间的短期波动效应, 尽管有部分系数不显著,  $\Delta \ln TRANS_t$  拟合度分别为0.829 6, 修正R<sup>2</sup>分别为0.739 5, 说明构建的VECM模型和劳动力非农就业自身能够有效解释73%, 解释力较强。误差修正系数为-0.001 4, 说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调整速度较慢, 长期协整系数对当期值起负向调整作用, 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率逐渐减少。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城乡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08 6和0.311 5,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短期影响较为复杂, 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不完全呈正向影响。因为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 在现有的体制下, 其家庭并不必然地迁入城市, 大部分农村非壮年劳动力成员仍然生活在农村, 迁入城市难以确保生活水平及质量。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短期影响为正向, 是三个因素中短期影响最大的, 弹性系数分别为0.294 0和0.205 5, 进一步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是被动转移。滞后1期和滞后2期市场化改革对农村

劳动力负担状况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因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非国有部门的壮大,非国有部门的进入门槛较低,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部门。市场化改革对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则可能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农村消费支出中工业产品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0%以上,工业品价格上涨较快而农产品价格多年零增长,使得农民消费支出占第一产业收入比重日渐增加;二是随着中央和地方对农村加大财政转移支持力度和惠农家电、摩托政策的实施,农民收入每增加100元会有70.4元用于消费。<sup>[27]</sup>

### 3. 脉冲响应分析

对VECM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首先应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笔者以滞后2阶建立模型,模型的特征根个数为8个,有一个为1,其他均小于1,

落在AR根图的单位圆内,表明系统稳定,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同时,LM自相关检验显示 $LM_1 = 12.7532$ ,  $P = 0.6907$ ;  $LM_2 = 22.5210$ ,  $P = 0.1272$ ,故不存在自相关。White异方差(无交叉项)检验显示, $\chi^2$ 值=183.9350,  $P$ 值为0.4048,故不存在异方差。VECM模型效果良好。

脉冲响应函数用Cloesky分解各变量影响时,变量的排序对冲击的共同部分分解有影响,基于排在前面的变量不同时受后面的变量影响的原则,本文对脉冲响应变量的排序为MS—INRATIO—AFFORD—TRANS。之所以这样排序,是因为我国市场化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出于对全国经济发展统筹的考量,不同时受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影响,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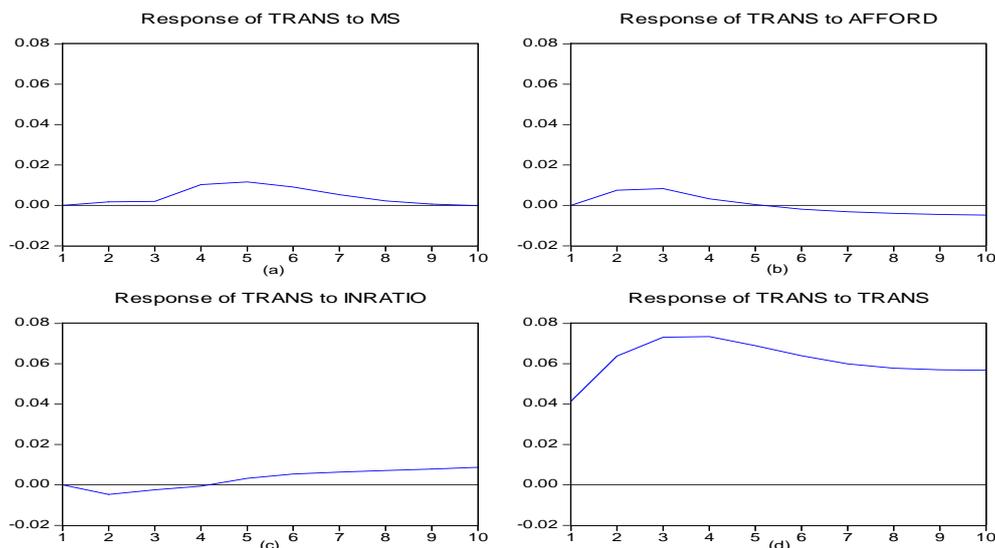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脉冲响应图

图2展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分别受市场化程度、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城乡收入差距变量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数:

(a) 市场化冲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从微弱正向影响逐渐增加,第7期攀至高峰,第10期开始逐步趋于稳定状态。这说明市场化改革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在第10期之后波动较小。

(b) 城乡收入差距冲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前2期为负向影响,从第3期开始正向影响逐渐增加,波动幅度高于市场化的冲击。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相对滞后。

(c) 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持续为正向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并且

前3期的影响较大,到第6期趋于稳定。这说明农村劳动力负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快,但是持续的时期不是很长。

(d)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自身冲击的波动幅度最大,第1至4期正向影响逐渐上升,从第5期逐渐下降至10期之后趋于稳定。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在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sup>[28]</sup>熟人的非农迁移可为个人社会网络中未迁移的劳动力提供直接的帮助和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带动劳动力流动。<sup>[12]</sup>

##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1983—2009年的数据,利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

之后,全国总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市场化改革、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在1983—1986年和1992—1996年两个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高潮期与长期均衡的偏离较大,与这两个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支持和市场化改革取向非国有部门的壮大密切相关。从短期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冲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及时且影响力度大;市场化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着长期的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冲击的响应存在2期时滞,从早期的微弱负向影响变为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之后趋于稳定。从以上的结论和基本逻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在我国,市场机制已主导了非国有部门或者是非正规部门的资源配置,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未深入改革之前,此类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蓄水池。就农村劳动力流动而言,在城乡二元就业制度短期内难以消除的背景下,发展和壮大非国有经济、允许非国有部门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等市场化制度安排是长期稳定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消费品支出中工业品份额日益增多,当来源与第一产业的收入不足以支出家庭消费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需求极为迫切。政府应从统筹城乡的角度,逐步提高农业补贴,加大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力度,实施系列惠农政策,增加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既能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同时又能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 参考文献:

- [1] 李实. 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 经济研究, 1997(1): 23-30.
- [2]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1999(47): 767.
- [3] 周天勇. 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J]. 经济研究, 2001(3): 75-82.
- [4] 蔡昉.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5): 16-25.
- [5] 李晓春, 马轶群. 我国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转移[J]. 管理世界, 2004(11): 47-52.
- [6] 李晓春. 劳动力转移和工业污染——在现行户籍制度下的经济分析[J]. 管理世界, 2005(6): 27-33.
- [7] Zhu Nong. The impact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s Review*, 2002(13): 213-230.
- [8] 程名望, 史清华, 徐剑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 经济研究, 2006(4): 68-78.
- [9] Hare Denise. 'Push' verse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outflows and returns: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status and spell dur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popul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5(3): 45-72.
- [10] 周其仁. 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 管理世界, 1997(5): 81-101.
- [11] 蔡昉, 都阳, 王美艳.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济研究, 2001(12): 41-49.
- [12] Zhang X, Li G.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2): 315-331.
- [13] 蒋乃华, 卞智勇. 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来自江苏的实证[J]. 管理世界, 2007(12): 158-159.
- [14] 王德文, 蔡昉, 张国庆.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 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英文)[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3): 123-145.
- [15] 乔俊果. 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研究: 1983—2009[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10): 54-62.
- [16] 樊纲, 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年)[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 [17] 蔡昉. 市场经济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英文)[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4): 118-125.
- [18] 王美艳, 蔡昉. 进一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着手点[J]. 学术界, 2009(1): 306.
- [19] 杨云彦, 徐映梅, 向书坚. 就业替代与劳动力流动: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 经济研究, 2003(8): 70.
- [20] 袁志刚, 范剑勇. 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J]. 劳动保障, 2003(10): 29.
- [21] 郭剑雄, 李志俊.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J]. 经济研究, 2009(5): 32.
- [22] 蔡昉, 杨涛. 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4): 14.
- [23] 曾学文, 施发启, 赵少钦, 等. 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 1978—2008[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0(4): 47-60.
- [24]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1.
- [25] 宋洪远, 黄华波, 刘光明.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5): 55-65.
- [26] 陈金永.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迁移[J].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4(1): 117-118.
- [27] 马晓河. 必须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扩大农村消费[J]. 宏观经济管理, 2010(2): 22-23.
- [2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李东辉